

從比較共產主義看中共百年

吳玉山*

摘要

今年 (2021) 中國共產黨迎來百歲黨慶，在這一個世紀當中最重大的發展當然就是中共在 1949 年的建政，成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我們今日討論中共百年，焦點自然是在於此一共黨國家如何能持續存在與發展，甚至與美國比肩，而成為世界兩強之一，而其體制又是否有變異的可能。本文的重點在於檢視政治學及其相關研究如何從理論的角度來瞭解 1949 年以後的中國大陸，探討中國研究與比較共產主義之間的關係，指出理論研究經常落於形勢變遷之後，流於解釋已經發生的歷史，而無法關注到當下正在進行的趨勢與未來可能出現的巨變。對於中國的研究，一開始過於強調其集體性（共產政權），在蘇東巨變之後又相反地強調其特異性（中國國別研究），或是其一般性（威權政治），而忽視了其區域性（現有共產政權集中於東亞區域）與貫時性（與歷史共產主義國家的可比性與理論的共通性）。在蘇東共產政權崩解後式微的比較共產主義在此卻正可以產生重大的學術貢獻，其意義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個是提供概念框架與關鍵變項；一個是提供跨時與現實的經驗案例。如能喚回比較共產主義，重拾其理論眼光，將對於今日中國政治的理解與未來穩定性的預判具有重大助益。

關鍵詞：中共建黨百年、中國研究、比較共產主義、比較威權主義

* 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國立臺灣大學政治系合聘教授，
E-mail: yushanwu@gate.sinica.edu.tw

收件日：2021 年 2 月 17 日；修正日：2021 年 3 月 17 日；接受日：2021 年 3 月 22 日

Centennial of the CCP: A Perspective of Comparative Communism

Yu-Shan Wu *

Abstract

In 2021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celebrates its centennial. The most significant landmark along its development path in the past one hundred years is obviously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C) in 1949. In Taiwan, the focus of our discussion naturally falls on how the party-state could continue to exist and develop into a superpower that rivals the United States, and what are the prospects of its transition into other forms of political system. The paper reviews how political science and other related disciplines study and theorize the politics of mainland China, and explores into the relation between China studies and comparative communism. It points out that theories in the field generally fall behind development on the ground, fail to capture ongoing trend and sense the possibilities of monumental changes ahead. They are thus relegated to explaining what has happened afterwards. The study of Chinese politics was originally defined by its organizational origins (communist system) without providing an explanation of regime dynamism, while after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and European communism it has become overly concentrated on its uniqueness (Chinese studies), or its general, non-democratic property (authoritarianism), at the expense of its regional nature (most of the existing communist regimes are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and its trans-temporal quality (commonality and comparability with historical communist regimes). At this point, to bring back comparative communism that has been on relative decline since the breakdow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st regimes may serve two purposes: provide conceptual framework and identify key variables, and offer historical and existing empirical cases. The utilization of the theoretical resources of comparative communism will go a long way toward understanding Chinese politics and assessing the stability of the party-state.

Keyword: Centennial of the CCP, Chinese Studies, Comparative Authoritarianism, Comparative Communism

* Academician, Academia Sinica; Distinguished Research Fellow,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 Academia Sinica; Jointly-Appointed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E-mail: yushanwu@gate.sinica.edu.tw

Manuscript received: 2021.2.17; Revised: 2021.3.17; Accepted: 2021.3.22

壹、前言

中國共產黨（以下簡稱中共）創立於1921年，其背景是在五四運動後，不少中國的知識分子對於西方的自由主義失望，而嚮往號稱實踐了馬克思主義的蘇聯，因此投入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¹時至2021年，中共迎來百年黨慶，在這一個世紀當中最重大的發展當然就是中共在1949年的建政，成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我們今日討論中共百年，焦點自然是在於此一共黨國家如何能持續存在與發展，甚至與美國比肩，而成為世界兩強之一，而其體制又是否有變異的可能。

政治學界對於1949年後中國的研究，可以分為幾個階段，主要是反映了中國與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重大變遷。「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 模式是初期的典範，接續的是各種分裂菁英模式，這反映著從1950到1960年代中共政治的劇烈變遷。到了文革結束、改革開放之後，又有「第二次革命」之說 (Harding, 1987)。在這三個時期，對於中共政治的研究，很準確地反映了實際的政治發展。而且這三類的理論，都是與研究整個共產世界的「比較共產主義」(comparative communism) 理論框架若合符節的。比較共產主義的兩大經驗支柱就是蘇聯與中國，其理論發展也反映了這兩個主要的共產主義國家的政治變遷。²

然而1989年及其後幾年的巨變，給比較共產主義的研究領域帶來了巨大的挑戰。蘇聯與所有歐洲共產主義政權的崩解，使得共產世界的版圖大幅收縮。中共也遭遇了八九民運的挑戰，顯得岌岌可危。於是比較共產主義研究乃成為轉型研究，或是後共研究。在20世紀盛極一時的共產主義運動與共產國家集團似乎已經成為明日黃花，只剩下以中國為首的少數幾個殘存者，其未來的命運也是極為黯淡，不是被預言為將要衰敗崩解，就是會出現政權轉移。由於可進行比較研究的對象巨幅減少，比較共產主義乃逐漸淡出比較政治的範圍，成為一個被歷史塵封的領域。³

¹ 關於五四運動與中國共產主義之間的關係從來就是學術界爭辯的主題（吳玉山，2019；周玉山，1979；金耀基，1979：463-467；陳國祥，1980；劉晶芳，2009）。周策縱 (Tse-Tsung Chow) 在他的名著 *The May 4th Movement: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 中便認為毛澤東誇大了共產主義知識分子在五四運動中所扮演的角色 (Chow, 1960)。但無可否認的是五四運動對中國共產主義與中國共產黨起了重大的催生作用。

² 當然反映著蘇聯與中共的權力對比，蘇聯的發展經驗在比較共產主義的文獻當中占有更大的比重，不過中共是最為重要的比較案例。

³ 在1980年代，比較政治的研究主要集中於三大區域：西方民主國家、共產國家，與開發中國家。1989年後的巨變使得這樣的三分法失去經驗意義，而比較共產主義的研究也逐漸退出學術舞臺。

不過在1989～1991年「蘇東波」的巨變後存續下來的共產國家展現了極為強韌的生命力與發展力，特別是中國的崛起（更準確地說是再起），從根本上改變了世界政治的格局，並且導引出美國與西方國家的反制。⁴中國及其發展模式顯然是必須要被仔細研究的。此時便出現了兩個策略：一個是將中國視為一個獨特的案例，以區域研究的方法來詳細研究它；一個是將中國當作是一個大型的威權主義國家，而將其政治視為一種威權政治的型態，並且和其他的威權主義國家一起檢視，這是政治學中比較政治的研究。這兩種策略自然有其不同之處，但是卻都沒有看到早期比較共產主義研究的成果，也忽略了在今日透過比較共產主義的理論眼光與經驗分析所可能獲得的識見。

在以下的討論當中，我們將檢視與中國政治研究相關的各家理論，包括比較共產主義中的極權與後極權理論、後共與轉型研究、中國政治的國別研究，與比較威權主義。這些理論被納入討論的範圍，是從理解1949年後中國政治的角度出發，而其意義也是在這一點上被評量。本文期待藉由觀察長期理論與現實政治的發展，尋覓最有效的理論工具，來解答中共政權如何能持續存在與發展，而其體制又是否有變異的可能。在過去理論研究經常落於形勢變遷之後，流於解釋已經發生的歷史，而無法關注到當下正在進行的趨勢與未來可能出現的巨變。對於中國政治的研究，一開始過於強調其集體性（作為共產集團的一員），其後又相反地強調其特殊性（中國國別研究），或是其一般性（威權政治），而忽視了其區域性（現有共產政權集中於東亞區域）與貫時性（與歷史共產主義國家的可比性與理論的共通性）。如能喚回比較共產主義，重拾其理論眼光，將對於今日中國政治的理解與未來穩定性的預判具有重大助益。由於本文所探討的焦點，是解釋中共政權總體穩定性的理論，因此不會特別討論個別的政策領域，包括經濟改革。⁵

貳、比較共產主義的出現與演化

比較共產主義的研究是隨著共產國家集團在二次大戰後的出現而逐漸興起的，其主要的動因便是共產主義的體制在全球的大幅擴張，遠遠超越了戰前蘇聯的範圍，因而使得比較研究成為可能與必須 (Tucker, 1967: 242)。當時雖

⁴ 王賡武認為，當今中國正在經歷歷史上第四次的興起，前三次是秦漢、隋唐，與明清的盛世 (Wang, 2004)。既然是再興 (resurgence)，自然與單純的興起 (rise) 有所不同，而有其歷史的意義 (吳玉山，2018)。

⁵ 經濟改革自然是與中共政權的總體發展密切相關的，不過二者間複雜的關聯不是本研究所關注的主題，而需要另外詳加探討。參閱吳玉山 (2007)、Hsu, Wu, & Zhao (2011)。

然對於眾多的共產主義國家均有不同的國別研究，例如Merle Fainsod (1963) 的名著 *How Russia is Ruled* 是針對蘇聯，而Franz H. Schurmann (1966) 的 *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 則是針對中國，但是這些著作都受到當時流行的「極權主義」典範的影響，而極權主義可以說是在比較共產主義的研究中最早興起的理論途徑。如眾所知，當Carl J. Friedrich & Zbigniew K. Brzezinski (1956) 發展極權主義理論的時候，他們的研究對象除了共產主義政權之外，還包括了納粹與法西斯，因此並非是為了進行比較共產主義研究而量身訂做的。依據Friedrich & Brzezinski的定義，極權主義是一種將權力的掌握無限集中，而將權力的運用無限擴張的統治型態，其實就是自由主義與憲政主義的完全對立面。極權主義的統治機制包括指導性的意識形態、單一的群眾政黨、獨裁的領袖、恐怖統治、對武力與通訊的全面壟斷，以及中央計畫經濟。凡是符合此種結構特徵的，便屬於極權主義。在經典的 *Totalitarian Dictatorship and Autocracy* 中，Friedrich & Brzezinski抽繹出極權主義政府的統治型態而加以分析，因此具有一定的抽象性與結構性，使其非常適合用來進行跨國，甚至跨體系的比較分析。在上述Fainsod & Schurmann的著作當中，我們便可清晰地見到極權主義典範的身影。Friedrich & Brzezinski的極權主義研究自有其缺點，包括反映冷戰的對抗思維、無法區辨極左與極右的運動政權，以及缺乏對於體系內部可能出現政治變動的體認等，其中最後一點至為關鍵。由於專注於制度面，而缺少對於極權主義動因的分析，因而此類理論所提供的猶如一張被凍結的畫面，不知其從何而來，也不知其將如何而去。由Hannah Arendt (1951) 所代表的另一系列極權主義理論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來探究此類政體產生的根源，算是提供了動因的分析，但還是缺乏一般性的動態理論。因此當共產政權開始逐漸分途演化後，極權主義典範就遭遇了很大的困難。然而，極權主義所提示的統治模式始終是日後新興理論的參照點。即使是對極權主義最強力的批評者，也是以這個典範所搭建的框架做為起始點。從這個意義而言，極權主義在比較共產主義研究中的意義有如現代化理論在比較政治研究中所代表的意義。

第一個對於極權主義理論的重大挑戰是蘇聯共產黨（以下簡稱蘇共）領導人與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領袖史達林 (Joseph Stalin) 的過世。當時所有的共產政權都出現了「小史達林們」，包括中國的毛澤東，並且採取了蘇聯式的發展策略。在制度、結構與政策上，所有的共產主義政權都展現了驚人的相似性 (G. Breslauer, 2020: *YouTube*)。於是當後史達林的蘇聯開始調整領袖與黨的關係（從個人崇拜到集體領導），以及黨國與社會的關係（從全面改造到去恐怖統治與一定程度的制度化）之時，對整個共產世界就帶來了極大的衝擊。有些共產國家選

擇了維持史達林模式，甚至激進化，有些則隨著蘇聯進入了減壓與制度化的下一個發展階段；有些國家與蘇聯維持緊密的扈從關係，有些則與蘇聯大起齟齬，甚至兵戎相見。當然也有試圖走出共產體制，但遭到蘇聯與其他集團國家的強力鎮壓（1956年在匈牙利、1968年在捷克斯洛伐克）。面對此種分殊化的發展，比較共產主義就產生了一些相適應的理論，而逐漸走出了極權主義的典範。

在史達林時代之後，中蘇共出現了不同的發展趨勢，中共是激進化下菁英分裂，蘇聯則是先有赫魯雪夫 (Nikita Khrushchev) 的改革，而後又有布里茲涅夫 (Leonid Brezhnev) 的重新保守化 (neo-traditionalization)。蘇聯政治發展的這兩個階段雖有不同，但均維持了體系的完整、去恐怖統治，與實現了一定程度的制度化，而與中共在毛澤東後期的情況有顯著的不同。中蘇共的分途發展，使得比較共產主義的經驗事例產生了重大的分歧。面對著中共文革後的持續激進化與菁英分裂，乃出現了各種菁英分歧模式，而以派系政治為主（如Nathan, 1973）；另一方面，反映著蘇共在改革與保守兩條路線之間的轉移，又產生了一系列的後極權主義模式（例如Kassof, 1964; Meyer, 1964）。Ken Jowitt對於這兩大共產主義國家的分途發展，更提出了列寧主義政權組織型態演化的三階段說。此說認為共黨如果能夠建立政權，則必然會走過「改造」(transformation)、「鞏固」(consolidation) 與「容納」(inclusion) 的三個演化階段。⁶中共在毛澤東時期是持續存在於高極權主義的「鞏固」階段，而蘇共的改革與保守路線則是在「容納」階段中的兩種變異 (Jowitt, 1974, 1975, 1983, 1993)，這樣就把中蘇共的兩類發展樣態用同一個組織演化理論加以包括了。這個理論也可以推廣到其他的共產政權，而將它們理解為處於不同的演化階段，例如北韓就如中共一樣是處於高極權主義的鞏固階段，而大部分的東歐共產主義國家則是追隨蘇聯進入了下一個較為包容的發展階段。總體而言，後史達林時期的中蘇共分途發展挑戰了極權主義理論，但是只要共黨政權維持一黨專政的統治型態，則極權主義的模式還是可以在加以修正後大體適用 (Odom, 1992)。

後史達林時期共產政權的分途發展（特別是中共文革的展開與中蘇共衝突的加劇）對於比較共產主義產生了強大的刺激效果。往昔學者雖然意識到共產世界已經大幅擴張，因此需要從俄羅斯與蘇聯研究中走出去，但是由於各個共

⁶ 根據 Ken Jowitt 的看法，在轉型的階段，列寧主義政權的任務是肅清反側，求取軍事和政治上的勝利。在鞏固階段，由於社會已經臣服，卻尚未被從文化與意識形態上所徹底改造，因此必須加以隔絕與鎮壓。到了容納階段，由於社會已經被改造成功，因此可以被政權所吸納。

產政權的體制相近，因此缺乏足夠的差異性以供比較。然而到了中蘇分途發展之後，比較共產主義就正式躍上學術舞臺，並且自我意識到已經超越了區域研究，而成為比較政治與社會科學的一支 (Tucker, 1967)。⁷因此，在戰後的1950年代，雖然已經有了比較共產主義之實，並且出現了極權主義的研究典範，但是比較共產主義之名卻並未正式出現；但到了中蘇共分途發展，以及中蘇關係益趨緊張之後，比較共產主義的名實都逐漸建立發展。該領域的重要期刊 *Studies in Comparative Communism* 也在1969年出刊，標誌著一個學術時代的開始。⁸

中蘇共的分途發展，挑戰了極權主義模式，也刺激了比較共產主義的發展。到了毛澤東過世後，經歷了華國鋒的過渡階段，中國大陸迎來了鄧小平下改革開放的風潮，這似乎揭示了中國也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與蘇聯相同的發展方向：去恐怖統治、去個人崇拜、淡化意識形態、重視物質與科技、強調理性治國，並推動一定程度的制度化。中共的「滯後」與「跟上」被認為是無可避免的。這對 Jowitt 來說是列寧主義政權的自然演化，也帶有新韋伯主義「卡里斯瑪」(charismatic) 常態化的意義。而對於早就預測共產政權為了國家發展的目標一定會淡化其烏托邦理想的 Richard Lowenthal 而言，中共的演化更是勢所必然，無可避免 (Lowenthal, 1970, 1974, 1983)。

由於極權主義模式缺乏對於體系變動的討論，因此不論是史達林死後中蘇共的分途發展，或是毛澤東死後中共走向改革開放，都沒有辦法從原有的理論框架中尋求解釋，而必須另闢途徑。Jowitt 的組織型態演化說是遵循新韋伯主義的典範，而 Lowenthal 的「發展 vs. 烏托邦」論則是帶有現代化理論的痕跡，揭

⁷ 1960年代是比較共產主義發展的重要時期，其基礎便是共產體制已經擴張到全球，而又已經展現足夠的差異性，也就是異同均充足。在這個階段的經典之作如 Zbigniew Brzezinski (1960) 的 *The Soviet Bloc: Unity and Conflict*、Richard V. Burks (1961) 的 *The Dynamics of Communism in Eastern Europe*、Chalmers A. Johnson (1962) 的 *Peasant Nationalism and Communist Power: The Emergence of Revolutionary China, 1937-1945*、A. Doak Barnett (1964) 的 *Communist Strategies in Asia: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Governments and Parties*、Robert A. Scalapino (1969) 的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in Asia*，與 Donald Treadgold (1970) 的 *Soviet and Chinese Communism: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從這些重要的著作中可以發現，比較共產主義有一個內在的限制，就是如果要對中蘇共這兩個主要的經驗事例進行比較，則對一般的西方學者而言，需要跨越兩個頗高的語言與文化門檻。因此絕大多數的比較共產主義研究都是集中於歐洲，或是亞洲內的各自比較，而較少有跨洲、特別是中蘇共的比較。一些例外的跨洲比較因而更顯珍貴，例如 Johnson (1962) 對於中共與南斯拉夫共黨的比較、Treadgold (1970) 的中蘇共比較，Thomas P. Bernstein (1984) 對於中蘇農業集體化的比較等。

⁸ 該期刊最早時稱 *Communist Affairs* (1962 ~ 1968)，之後隨著比較共產主義研究的發展而更名為 *Studies in Comparative Communism* (1969 ~ 1992)，一共出刊了 24 年 (第 2 ~ 25 卷)，在比較共產主義學界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力。

示現代化與發展必然帶來體系的轉變。這兩種理論在解釋中蘇共的分途發展，與補足早期極權主義理論缺乏體系變動的解釋機制上具有重要的意義，然而這兩者也都沒有提及跨出列寧主義體系的可能性。這是一個比較共產主義理論界的一個普遍的現象。當共產政權逐漸穩固，並在全球鋪展開來之後，比較共產主義的研究重心很自然地集中於體系的運作，而不是推敲體系可能轉變的條件或崩解的可能。

參、比較共產主義的危機

1979 ~ 1989年是比較共產主義的輝煌時期。此時絕大多數的共產主義國家，特別是蘇聯與中共這兩個領頭的共產政權，都脫離了高極權主義、恐怖主義、個人崇拜，與意識形態掛帥，而追求現代化與物質發展。在經濟改革的領域，中國大陸後發先至，無論是市場化或是所有制改革都超越蘇聯與東歐，逐漸走上了東亞發展國家的道路。不過無論在經濟改革的政策上是否有所差異，絕大多數的共黨政權都維持了一黨專政，同時處於類似的發展階段，因而彼此間具有高度的可比性。

到了1980年代末期，蘇聯已經存在了70年，其他在二戰後出現的共黨政權也已經成立了40年。共產集團與西方國家的長期對立，以及國際上的兩極體系和冷戰格局似乎都成為不可動搖的結構。比較共產主義研究「對方陣營」，也成為比較政治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塊。然而比較共產主義對於共產政權的動力學仍然缺乏深入的探究，而僅是假設此類政體具有極高的社會控制能力，因此其經濟政策或可能轉變，但體制的韌性則不會變動。在1980年代末比較共產主義對於自身的檢視當中，看到的通常是一些枝節的議題，例如共產世界已經進一步地擴張，因此原先以蘇聯經驗為主的理論框架應該更為多元化 (S. White, 1987: 209)，而看不到對於共黨體系本身存續可能性的討論 (Cox, 2008: *Social Science Open Access Repository*)。因此當1989年巨變出現的時候，整個學科領域猝不及防，無法提供預測與解釋，而顯現整體失能的狀態。

比較共產主義的問題，其實出現在許多學科領域當中。知識被一再地細碎分化，歸屬於彼此難以相通的領域；研究者被鼓勵接受一套議題與方法上的假設，並以此為基礎追求專精；於是為了厚度而犧牲廣度，無法思考大的問題。共產政權的存在，就是比較共產主義的學科預設，是一切細化研究的基礎，其本身不是討論的對象 (Cox, 2008: *Social Science Open Access Repository*)。由於此一原因，比較共產主義無法處理共產政權的崩潰問題，也就是無法處理本身研究對象的消滅。當蘇聯解體、歐洲共產政權逐一崩潰之時，比較共產主義也面臨了自身存亡的挑戰。

在1989～1992年間，歐洲的共產國家逐一崩解，這包括蘇聯、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東德、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南斯拉夫與阿爾巴尼亞。非洲許多自稱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社會主義國家也不再存在，或移除其意識形態標誌，例如南葉門、索馬利亞、衣索比亞、莫三比克、安哥拉等。至於在柬埔寨與阿富汗的共產政權則是在戰爭中殞滅。時至今日，仍然可以稱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共產政權僅存在於中國大陸、北朝鮮、越南、寮國與古巴等五國。這與二戰後到1989年之間的共產主義全盛時代相比，不啻天壤之別。⁹

在共產政權大多消亡，後共國家經歷劇烈的政治與經濟轉型之際，比較共產主義就轉化成後共研究，或是轉型研究。¹⁰然而不論是後共或是轉型都不是可大可久的研究領域。後共僅是代表一定的制度遺緒，隨著時間其意義自然逐漸消滅；而制度轉型固然風行一時，但是制度的變遷總有終點。¹¹這些國家就政治而言，乃逐漸納入新興民主國家 (*nascent democracies*)；就經濟而言，則許多成為新興市場經濟體 (*emerging market economies*)。當然一些國家在政治上處於民主與威權之間（例如競爭性的威權體制），或在經濟上採行國家資本主義，並沒有轉型成接近西方的類型，因此後共國家在政經制度上呈現了多種樣貌，也會變動不居。

後共研究與轉型研究並不是傳統的比較共產主義，前者為其遺緒，後者則有更廣泛的經驗指涉。¹²原有的比較共產主義由於現今的實例僅剩下五個國家，因此難以為繼，便逐漸退出學術舞臺。而即使是這幾個少數的殘存者，其未來的命運也被認為是極為黯淡，不是被預言為將要衰敗崩解，就是會出現政權轉移。天安門的強力鎮壓與歐洲共產主義政權的全面崩解更強化了這種論述，例如 Michael (1990)、Myers (1990)、Domes (1990)、齊墨 (1991)、G. White (1993)。

⁹ 根據 G. Breslauer (2020: *YouTube*) 的計算，在極盛時期，全球共有 16 個共產主義政權，其中 9 個在歐洲，6 個在亞洲（中國、北朝鮮、越南、寮國、柬埔寨、蒙古），1 個在加勒比海（古巴）。八九巨變之後，所有的歐洲共產主義政權全數崩潰，亞洲的柬埔寨與蒙古也經歷了非共化，因此僅存的共產主義國家便剩下 5 個。

¹⁰ 這樣的發展可以從研究比較共產主義的旗艦學術刊物 *Studies in Comparative Communism* 更改名稱上看出來。該期刊在出刊了 24 年 (1969～1992) 之後，從 1993 年 (Vol. 26) 開始，反映著大批前共產主義國家的政治轉型，將其名稱改為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迄今。

¹¹ 就經濟轉型而言，究竟應該採取「震盪療法」(*shock therapy*) 或是「漸進改革」(*gradualism*) 曾經引起極大的爭議。不過隨著經改或快或慢地進行，這類的爭議也就逐漸淡去。參見吳玉山 (1996)。

¹² 「轉型學」(*transitology*) 一般而言被認為起於 Guillermo O'Donnell 與 Philippe C. Schmitter 對於南歐與拉丁美洲政治轉型的開創性研究，其後在東歐與前蘇聯的民主化則為轉型學提供了更為豐富的經驗事例 (O'Donnell, 2013)。

肆、中國研究與比較威權主義

在1990年代，學術界充滿了福山式的樂觀期待，認為自由主義的思想與制度將光耀普世，而「全球化」的現象似乎也驗證了此一宏大的潮流勢不可擋 (Fukuyama, 1992)。杭廷頓 (Samuel P. Huntington, 1993) 對於「第三波民主」的論述更將焦點集中於民主制度的建立與鞏固，帶動了大規模民主研究的風潮。共產政權的相繼倒臺被認為是第三波民主化的高峰。此種樂觀的期待雖然在日後被文明與族群衝突的警示所沖淡 (Huntington, 1998)，也被強調制度選擇至關重要的學者所質疑 (Lijphart, 2000)，但是總體的樂觀自由主義氛圍並沒有改變。其原因就是冷戰已經結束，共產主義已經被打倒，美國具有全球的單極優勢，是無可置疑的自由主義霸主，西方的制度與理念也因而具有最高的正當性與擴張力。

然而共產主義國家並沒有滅絕，他們在既有的政治制度下持續發展。此時由於比較共產主義的研究已經逐漸退出學術主流，因此對於現存共產政權的研究就出現兩個發展的趨勢：一是往區域與國別研究發展（如上所述），一是往比較威權研究發展；前者比原有的比較共產主義研究更為分殊細化，而以各國為對象，後者則更為一般化，因此是兩個方向相反的發展趨勢。又因為中國是現存共產政權之首，而且國力不斷增長，受到學界、政界與一般大眾的關注，因此中國區域研究與納入中國事例的威權主義比較研究乃大行其道。

對於1949年後中國政治的研究在理論的層次是被含括在比較共產主義的框架之內，但又有很強的國別與區域色彩，並在蘇東共產政權崩解與比較共產主義的研究消逝後更加強勢興起。中國研究一開始受到極權主義模式很大的影響，而後又被文革的經驗所型塑，這就是Harry Harding (1984b) 所謂的第一代與第二代的中國研究學者。文革使得中蘇共分途發展，也使得中國研究開始探究文化與心理等非制度性因素（例如Pye, 1981, 1992），而與強調制度的極權主義有明顯的不同。造成此一現象的原因自然是相同的制度環境（極權主義體制）無法解釋實際政治中的巨大差距（中蘇共的不同經驗）。由於文革時菁英分裂與派系政治的現象極為突出，因此派系鬥爭途徑在中國政治的研究中具有特殊的地位 (Nathan, 1973)。¹³各種「關係」也是特別受到重視的一塊，被認為構成

¹³ 在臺灣的中共研究學界傳統上便是以派系鬥爭模式來看待中共政治，而累積了相當的成果。此與共同的文化環境與研究者的親身經歷有相當大的關聯。參見郭華倫（1989）的巨著《中共史論》四冊。

中國非正式政治 (informal politics) 的基礎 (Dittmer, 1978)，而且不僅對於權力鬥爭產生影響，也決定了日後經濟改革的路徑 (Dittmer & Wu, 1995)。關係的性質有多種，家族、學校、工作經驗等五同關係都可以成為關係的基礎 (Whitson, 1969)。不過此種關係、派系與非正式政治的現象並不僅限於中國，而是被認為普遍存在東亞地區 (Dittmer, Fukui, & Lee, 2000)。

雖然有這些區域與文化心理的因素，以及派系的顯著現象，但是此類的研究途徑所解釋的，不過是一種菁英分裂的現象。除了派系之外，菁英也可能依世代、地緣、官僚機構、意識形態，或政策偏好等因素而分裂，並構成權力與決策的競逐者 (Harding, 1984a; K. Lieberthal & Oksenberg, 1988; Solinger, 1993)。依照競逐者的目標是關乎個別或全體利益，以及彼此是否沿著正式的邊界劃分，可以歸納出官僚政治、獨立王國、意見團體與派系等多種菁英競爭模式 (Dittmer & Wu, 1995: 479)。無論是哪種模式，所強調的都是菁英內部不是鐵板一塊，而是在決策過程中相互競爭的。李侃如 (Kenneth G. Lieberthal, 1992) 的「碎裂化威權主義」(fragmented authoritarianism) 便將此種決策的情況以理論概念加以捕捉，而獲得很大的迴響。不過由於「碎裂化威權主義」僅著重於菁英內部的多元化，而較少提及國家與社會之間的關係，似乎仍然維持著早期極權主義的觀點，認為社會僅是菁英決策的被動接受者，本身全無能動性，因此遂有 Andrew Mertha (2009) 提出「碎裂化威權主義2.0」的觀點，強調社會行為者在政策過程中的能動性，這等於是把多元化從菁英內部向社會方向延展，因而更進一步地鬆動了極權主義的假設。然而黨國究竟是如何將社會行為者納入政策過程當中而又不至於影響到本身對政治權力的壟斷呢？「諮詢性威權主義」(consultative authoritarianism) 可說是成功地捕捉了這種特殊的關係 (He & Thøgersen, 2010; Teets, 2013; Truex, 2017)。¹⁴總體而言，中國政治的研究自從文革以降，就比較強調菁英的多元性（包括派系及其他的菁英分裂與競爭模式），也不斷探索官民調和的可能性（包括與社會和解及放鬆的一些後極權特徵）。這樣的趨勢，到了天安門事件與蘇東共產政權解體之後仍然持續，成為第三代中國研究學者的一個特色 (Harding, 1984a; Perry, 1994)。

從菁英分化到國家社會關係轉變的思路（也就是從碎裂化威權主義1.0到

¹⁴ 關於中共的威權體制如何藉著各種機制以獲得人民的接受，除了「諮詢性威權主義」，尚有強調後發工業化、國家效能與社會主義遺緒的「接受威權」(accepting authoritarianism) 之說 (T. Wright, 2010)，與指出地方政府經常透過與民眾「討價還價」的「談判威權主義」(bargained authoritarianism) 之說 (Lee & Zhang, 2013) 等。

2.0，與諮詢性威權主義），其實在早期的比較共產主義理論中就有清楚的展現。在後史達林時期，蘇聯逐漸轉化成集體領導，菁英內部出現分化，形成利益集團 (Skilling, 1966; Skilling & Griffiths, 1971)。恩庇侍從關係與派系政治在蘇聯與東歐也是非常明顯的現象，特別是在布里茲涅夫的時代，並成為學界所關注的主題 (Willerton, 1987)。黨國對於社會也採取較為包容的態度，不再視為要予以改造的對象 (Jowitt, 1975)。當時多位自由派的學者認為蘇聯的內部已經出現了多元化的趨勢，而與早期的極權主義大相逕庭 (G. W. Breslauer, 1982; Cohen, 1985; Hough & Fainsod, 1979)。因此共黨國家統治菁英內部的一些多元競爭，以及國家與社會關係的一些鬆動，是完全處於傳統的比較共產主義研究系絡當中的。

蘇聯解體後的中國研究，除了持續強調派系與後極權的特色之外，又往制度化的方向發展。制度化強調的是老人政治影響力的降低、各級幹部進用規則的明確化（包括年齡與任期的限制）、集體領導分工與運作規律的出現等（寇健文，2010）。這似乎是具有高度「中國特色」的。制度化是從鄧小平時期開始奠定基礎，但是同時又出現了老人政治的現象，可以說是多重傾向並存。到了江澤民的時期，制度化逐漸穩固，而在胡錦濤時期達到最高峰，成為一種普遍的規範，並且逐漸約束到黨國的最高領導層級 (Bachman, 1992, 2001; Z. Bo, 2004; Wu, 1997, 2004)。同時，集體領導的趨勢也已經形成，鄧小平之後中共似乎已經不再出現強人 (Z.-Y. Bo, 2005)。不過由於威權體制內部的制度化缺乏社會的約制，領導階層的強制退休與其利益相抵觸，而最高領導人也不免有集中權力的傾向，因此制度化能否持續始終是難以確定的 (Shirk, 2001; Wu, 2015)。果不其然，在習近平依照既有的制度化規則接任總書記之後，任期與年齡限制便開始鬆動，而集體領導也逐漸走向總書記大權獨攬，制度化乃出現逆轉的趨勢。

從中共制度化的歷程來看，此一現象的轉折畢竟還是出現在列寧式的黨國體制之內。一方面可能出現狂飆的革命政治，一切規律均被打破，而至高領袖掌控一切；另一方面又可能出現穩固的集體領導，所有幹部的升遷調任都依據一定的既有規則，連最高領導階層也不例外。一個共黨體系可能游移在這兩個極端之間，但卻無法超越。所以即使是史達林或毛澤東也無法超越黨而建立個人獨裁，而不論是布里茲涅夫或是胡錦濤也不會容許建立規律性的多黨競爭機制，以致於影響到共黨對於政治權力的壟斷。共黨政權在制度化的尺標上所可能移動的範圍，畢竟還是被政權本身的性質所決定。這就使得制度化仍然是比較共產主義的議題，適合以比較共產主義的理論與角度來進行探索，以獲得更廣泛的經驗資料

（不論是歷史或跨域的），與進入更深入的理論層次。這也代表著，中國政治的區域研究可以從比較共產主義獲得更廣與更深的發展空間。

晚近在中國研究中出現了對於學習型列寧主義政黨與黨國控制機制（特別是信息方面）的深化研究。前者以前所未有的深度探索中共體制的運作與對社會的回應與控制（例如Tsai [2016]、Tsai & Dean [2013]、Tsai & Kou [2015]），後者則透過大數據的耙梳來呈現中共如何藉著網路控制來進行意見導向與言論審查 (King, Pan, & Roberts, 2013, 2014, 2017)。無論是學習型列寧主義，或是網路控制，都是在探索新型的黨國與社會關係，並且著重於控制機制的部分，這與極權主義典範中所強調的國家控制手段（武力、信息、經濟）是完全相符的。

蘇東巨變後反映著比較共產主義的式微，對於現存共產政權的研究或是往區域與國別研究發展，或是往比較威權研究發展。就後者而言，把中國視為一個威權主義國家，並與比較政治和比較威權研究對話，成為一個重要的趨勢。在此關鍵的連結是「威權韌性」(authoritarian resilience)。黎安友 (Andrew J. Nathan, 2003) 在其具有重大影響力的論文“China’s Changing of the Guard: Authoritarian Resilience”中，將中共的制度化與威權韌性連結起來，其實便是將中國研究與比較威權研究連結起來。¹⁵比較威權研究在早期較為偏重類型學與傳統制度層面 (Linz, 2000)，後期則加入了理性抉擇的視角，強調獨裁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策略互動。威權政體的制度化程度被認為是決定其存續能力的重要條件，而「籠絡」(cooptation) 則是制度化的重要意義 (Gandhi & Przeworski, 2006, 2007; Magaloni, 2008)。制度化分析的焦點經常是威權主義的立法機構與政黨，以及此類機構對於政權的韌性與存續所代表的意義 (Gandhi, 2008; Kim & Gandhi, 2010)。此外，也有研究者強調強力機構與信息所扮演的角色 (Way, 2005)。由於失去了比較共產主義的理論依托，中國就被納入比較威權的框架中加以檢視，重點是發掘導致威權韌性與威權持續的因素（例如Lü, Liu, & Li [2020]）。比較威權一般先由預設推演出理論模型，然後採用大數據的經驗資料來加以檢證。研究的結果通常會指出一黨式的威權主義政權具有較高的存活率，這就使得共黨政權（特別是中國）又從大量的經驗事例中被突顯出來。顯然地，共黨政權不是一般的威權主義政權，

¹⁵ 黎安友認為中共在四個領域的制度化有利於其威權韌性：第一，政治繼承遵從一定的規範；第二，以才能作為拔擢政治菁英的標準；第三，組織的分殊化與功能的專業化；第四，建立政治參與的管道以增加中共的政權合法性 (Nathan, 2003)。就其內容而言，完全是在中共政治的傳統範圍之內，但是其框構 (framing) 卻是將中共政治與比較威權研究連接起來。

把共黨體制僅僅視為威權體制之一將會遺落其重要的制度特徵，而無法深化對於此類政權，特別是共產中國的理解。

試圖對所有的威權政體做一般化的理解是困難的，其根本原因是威權政體是民主政體的剩餘概念 (residual category)，是不符合民主制度標準的各種政治制度的總和，其異質性非常高。特別是如果還加上介於威權與民主之間的「競爭性威權體制」，則各種威權與准威權的政體更是種類繁多，其運作模式各異 (Levitsky & Way, 2010)。早期對於極權主義與威權主義政權是強調其區別的 (例如 Kirkpatrick [1983])，然而隨著蘇東共產政權崩潰與比較共產主義研究式微，現存共產政權也被歸入威權政體。於是共產體系的特異性消失，而中國也僅是一個特大的威權國家。由於與其他的威權國家列入同一個範疇 (而僅是在衡量民主與自由的大型資料庫中的分數有所不同)，因此共黨體系的特徵便無法獲得足夠的重視，這是過度一般化所導致的問題。

如果中國區域研究與將中國納入比較威權研究都有其侷限，區域研究失之過窄，而比較威權失之過寬，那麼對於中國政治的研究者而言，是不是還有其他的選項呢？

伍、喚回比較共產主義

對於中國政治發展的分析，必然要從現今的共黨體制出發，來討論其穩定與存續的展望。因此一切討論的起點，自然就是今日中國的政體，也就是列寧主義的黨國體制。這既不能窄化成是中國獨特的制度 (因為在歷史與現實中許多其他的國家均具有此種政體)，也不能概括為威權體制 (因為那樣會漏失了此一體系的核心特徵)，而必須加以據實檢視。比較共產主義在層次上處於中國區域研究與比較威權研究之間，恰巧屬於最適當的中間階層 (meso-level) 研究路徑，因此具有很大的學術意義。

比較共產主義對於中國研究的意義在於兩個方面，一個是提供概念框架與關鍵變項；一個是提供跨時與現實的經驗案例。就前者而言，比較共產主義最初的研究典範是極權主義模式，它提供了一個極權體制的理念型框架，使得我們能夠理解在人類社會的科技與組織能力到達一定程度後，政治權力可以集中與延伸的極致。另一方面，它又提供了一個參照點，使得我們得以將不同的黨國體制加以定位，估量它們與理想點之間的距離、政治變遷的幅度，與彼此間的差距。初期的極權主義論述最大的缺陷是未將其視為一個理念型的框架，而是當成不變的實際政治情境，因此當後史達林時期各國共黨體制開始分途發

展之後，第一代的極權主義理論便顯得落後於形勢，並且暴露出其缺乏對於變動的解釋機制。然而接續的比較共產主義理論卻在放寬了極權主義的僵固假設後，仍然持續沿著極權主義所指出的幾個核心變項進行探索，以含括後史達林時代共黨政權的各種變遷。從這個意義來說，整個比較共產主義都是在和極權主義進行對話的。

由極權主義所點出，而由其後的比較共產主義研究所持續關注的核心變項是：第一，黨內權力集中於最高領袖的程度，第二，政治制度化的程度，與第三，黨國控制（包括驅動與回應）社會的程度。各種分析蘇聯路徑的後極權主義模式所強調的便是集體領導、一定程度的制度化（但受制於新傳統主義），與從「鞏固」到「容納」的組織演化階段，這分別就是對應著權力集中、制度化與黨國社會關係的三個核心變項。而分析中共政治發展的各種菁英分歧模式，包括最占優勢的派系鬥爭模式，同樣是強調在核心變項上的發展（毛掛帥到派系鬥爭、反制度化、高度動員的政治運動與維持「鞏固」階段），而與蘇聯的發展有極大的不同。由於出現了中蘇共的制度與權力鬥爭，並在核心變項上展現了明顯差異，因此促進了比較共產主義的快速發展。其後中國大陸進入改革開放的時代，開始與蘇共合流，在若干改革方向上甚且超越。這也表現在鄧小平時期及其後的去權力集中、開始制度化（但受制於老人政治），與全面地改變黨國與社會的關係。比較共產主義的新韋伯與新現代化理論都預示到中共的「歸隊」現象，也就是從「鞏固」走向「容納」，從「烏托邦」走向「發展」。

在蘇東巨變之後，對於仍然存續的共黨政權研究走向了區域國別與比較威權的兩條路徑。就前者而言，主要自然是中國研究。在此仍然是沿著比較共產主義的三個核心變項來進行探索，並以此衡量中共政權的穩定性與持續性。其中「關係」、「派系」、「非正式政治」、「碎裂化威權主義」等都是探討黨國體系內權力集中的程度，而「碎裂化威權主義2.0」、「諮詢性威權主義」等則是延伸到黨國與社會的關係。就學習型列寧主義政黨與黨國信息控制機制的深化研究而言，同樣是探討黨國社會關係，但重點則是在中共如何維持與發展了社會控制的機制，因而能夠維持政權穩定。在中國研究中，最有意義的是有關於制度化的探討，並在此與比較威權研究產生了連結。中共的制度化在改革開放後逐步發展，雖然在鄧小平時期仍然受到老人政治的影響，而在江澤民時期仍然無法拘束到最高領導人，卻還是次第完善，而在胡錦濤時期達到高峰，但近期又在習近平主政後出現逆轉。這樣的上下波動，一方面呈現中共在制度化的面向上並非線性發展，一方面又展現在共黨體制中制度化的範圍與極限。總體而言，不論是在權力

集中、制度化，或是在黨國與社會的關係上，後八九時期的中國研究仍然是在處理比較共產主義的核心變項，並處於其理論範疇之內。

在中國政治的相關研究當中，與比較共產主義交集較為有限的是比較威權研究。由於理論的源起與主要的經驗事例並非共黨政權，因此其所關注的焦點經常是威權政體與有限的反對勢力在部分開放的代表機構中的互動，以及此種政治型態對於經濟表現與威權存續所帶來的影響 (Levitsky & Way, 2010; J. Wright, 2008; Pepinsky, 2014)。中共與其他的共黨政權並非此類政體，充其量僅能視為比較威權研究的極端案例。將中國納入這一類的研究框架，雖然對於比較威權增加涵蓋面有其意義，但是較無法深化對於中國政治的研究。在這裡最為關鍵的是比較共產主義的核心關懷是共黨的角色與地位、作用與影響，而在比較威權主義的分析當中，並沒有這種對於共黨的認識與著重。

總體而言，比較共產主義藉著對於共產政權數十年的研析，得以提供對於此類政權是否穩定、如何發展的有效理論框架與關鍵變項，而將焦點集中於黨內權力集中、制度化，與黨國社會關係等三個面向，今日對中國政治穩定的研究也大體圍繞著這三個主軸。不過這個框架是針對共產政權的常態研究，也就是在共黨壟斷一切政治權力下，黨內權力可以在一人絕對獨裁與集體領導／菁英分裂競爭的狀態間移動，制度化可以在打破一切既有規律與全黨（包括最高領導人）服從明文與非正式遊戲規則間轉移，而黨國社會權力關係可以在黨國恣意介入動員與容認特定社會自主範疇之間變動。然而無論一個共黨政權在這三個面向上如何轉變，只要共黨壟斷一切政治權力的基礎特徵不變，黨國體制的框架就能夠維持。而共黨的權力壟斷則是根植於不存在獨立的反對黨、壟斷政治參與，以及沒有競爭性的選舉。

一個成熟的共黨政權可以進行有序的集體領導、菁英的進用離退完全依據既定規範，而黨國社會關係則允許私部門與第三部門的存在與運作，但在常態之下，集體領導不會擴張成真正的黨內民主，人事任免不會忽視黨管幹部的原則，而黨國也不會放棄對社會組織的全面滲透。最為重要的，是絕不會有獨立的反對黨與具競爭性的選舉。如果以上的基本原則被破壞，共黨政權便有可能喪失其壟斷權力的地位，體系轉變也將成為可能。因此，比較共產主義的視角，讓我們看到兩種類型的變化：體系內變動與超體系的變動，而兩種變動都是表現在黨內權力集中、制度化，與黨國社會關係等三個面向上。如果是在常態性的變動範圍之內，而共黨維持政治權力的壟斷，則出現的是體系內的變動；如果出現了常態範圍之外的變化，使得共黨失去了對於政治權力的壟斷，則出現的是超體系的變動。

比較共產主義在中國研究上的第二個意義，是提供跨時與現實的經驗案例。從蘇聯成立到歐共政權崩潰之間的70餘年間，共產世界提供了大量體系內變動的案例；而蘇東巨變又帶來了同樣大量的超體系變動案例。數個巨變後存續的共產政權（中國、越南、北朝鮮、寮國與古巴）也持續在創造經驗案例。這樣豐富的案例資源是單純的中國研究所無法提供的（中共本身僅有數次體系內變動）。另一方面，雖然比較威權研究有更大量的案例，但是這些案例的異質性太大，與中國的共產政權並不共享定義性特徵 (defining features)，也無法在三大主軸上進行比較。

在豐富案例的基礎上（包括歷史與現存），比較共產主義的研究可以針對兩類議題進行研究設計，第一類議題是驅動黨國體系內變動的原因，第二類議題是導致超體系變動的因素。就前者而言，又可以延伸出三個方向，一是中共政權本身的歷時性變動；二是中共與其他現存共產政權的比較；三是所有共產政權（歷史與現存）的比較。傳統上解釋後史達林時期發展的理論途徑，包括新韋伯的組織型態變遷理論與新現代化理論，都有可能在此提供假說以供檢驗。不過傳統理論未能關注在三個黨國體系的變遷主軸之上，因而需要進行調整。

就具體的議題而言，中共政權在習近平時代出現了反制度化的現象。這讓我們關注在權力集中與黨國社會關係的面向上是否也出現了與過去相反的發展。如果確實如此，即權力集中、反制度化與黨國加強管制社會是同步發生的，則我們必須探究造成同步的原因為何。同步的方向是再極權化的，在中國的環境中就是「再毛化」(re-Maoization)。雖然當今的環境與毛的時代差距甚大，然而就習近平的大權獨攬、打破任期限制，與對社會強化管制而言，的確有回到過去的趨勢。因此，我們必須問的問題是：為何出現體制內重大變動，為何在三個面向上同步，以及為何變動的方向是再毛化。

這樣的問題可以藉著宏觀中共本身歷時性變動、比較其他現存共黨政權，與比較所有共黨政權的幾個策略來解答（例如寇健文〔2000〕）。其中與現存共黨政權，特別是與越南的比較，是具有特殊意義的。在權力集中、制度化與黨國社會關係的三個面向上，越共與中共類似但亦有所不同。這包括四駕馬車的頂層分權、類似的制度化安排，與吸納性較強的黨國社會關係。越共從胡志明時代開始，就沒有毛澤東式的一言堂，而較為接近集體領導。此一傾向更因為胡志明在越南統一前逝世而增強。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越南的北圻出總書記、中圻出國家主席，而南圻則出總理，展現了地緣與歷史結合的特殊領導型態（梁錦文，2006）。此種情況加上重量級人士在擔任國會主席時刻意強化其權力基地（包括總書記農德孟與阮富仲），因此國會主席也成為頂層重要的權

力職位。¹⁶頂層菁英的相互競爭曾導致在越共十二大之前總書記阮富仲與總理阮晉勇彼此競爭、互不相讓，結果甚至在十二大時出現了二人競爭總書記之位的局面。在制度化方面，越共有與中共類似的進用離退規律，但在屆期與年齡限制的方面比較有彈性。而在黨國與社會關係方面，越南則展現了較為開放的態度，這特別是表現在國會的角色上。越南的國會可以對於官員進行不信任投票，並令官員去職，這在共黨國家是聞所未聞的。不過由於越南的體制是一黨專政，因此國會的開放並不代表越共對於權力的壟斷有任何放鬆。¹⁷從中越共的比較當中，可以看出亞洲共產政權在蘇東巨變後的發展，驗證與解釋三個政治面向是否始終同步，與探索體制內變化的動因。¹⁸

中越共的比較在習近平與阮富仲時期產生了更大的意義。阮富仲在原國家主席陳大光於2018年過世後以總書記兼任其職，打破了四駕馬車集體領導的慣例，將權力集中起來。在2021年的越共十三大上，阮富仲又突破了1986年六大以來的慣例，以76歲高齡第三次擔任總書記。阮富仲在掌權期間發起了聲勢浩大的反貪腐運動，對黨政幹部施以嚴格的紀律與刑事處分，包括政治局委員、胡志明市黨委書記等高級官員；也對社會上的異議分子進行鎮壓，以防止和平演變。因此不論從權力集中、制度化，及黨國與社會關係來看，阮富仲時代的越南都出現了向中共的模式靠攏的趨勢。究竟此一現象是暫時的，或反映了一個結構的趨勢；是越南本身政治演化的結果，還是受到習近平時期中共強大的示範效應影響，都值得仔細探索。更重要的是透過對於中共與越共這兩個高度近似，卻又在特定點上明顯不同案例的跨時比較，可以抽繹出影響共黨政權體系內變遷的原因，以深化對於中共政治的理解。¹⁹

¹⁶ 農德孟是第九屆與第十屆的國會主席，卸任後當了十年的越共總書記 (2001 ~ 2011)；而阮富仲是第十二屆的國會主席，卸任後接掌總書記之位迄今 (2011 ~)。

¹⁷ 越南並沒有除共黨外的其他合法政黨，黨外的意見與利益是靠「越南祖國陣線」這個超級統戰機構來加以整合到黨國體系之內（例如決定民意機構的候選人），其他的政治組織則全力打壓（梁錦文，2020：139-143）。所以，越南過去表現類似以往東歐共黨國家在1980年代所嘗試的「一黨多元主義」，也就是由共黨掌控一切，但允許黨內有不同的聲音，甚至形成制度性的競爭，同時也藉著這樣的有限多元來滿足民間的要求。如果以越南的國會並非橡皮圖章便認為有民主化的可能，則可能是一個過度的推論。事實上，越南的民意機構捲入了高層的政治競爭，所以國會中的聲音是反映出集體領導內部的矛盾，而非自由化的表現。

¹⁸ 有關於中越共的比較，可參考吳玉山（1995，第五章）、Wu & Sun (1998)、Kerkvliet, Chan, & Unger (1998)、McCormick (1998)、Wu (2004)、吳安琪（2017）。

¹⁹ 在目前僅存的五個共黨政權中，越共與中共最為相近。除了越南與中國在傳統上的歷史文化淵源之外，越共與中共的發展過程也有許多相似性，兩者都在20到30年代建黨，

比較共產主義也可以研究共黨政權的超體系變動，在這裡最重要的案例就是蘇東巨變後存續與崩潰的共黨政權。政權的崩潰便是超體系的變動，表示共黨失去了對於權力的壟斷。明瞭超體系變動的原因，自然有助於理解與預判中共政權的穩定性與存續能力。在1989～1992年之間，歐洲的九個共黨政權全數崩解，但是非歐的七個共黨政權卻有五個存續，並且其中有四個是在東亞。是什麼原因造成此前盛極一時的共產世界逾半崩解，而亞洲的部分卻能逆勢存在、持續發展？具體而言，為何蘇共崩解，而中共存續；或為何歐共崩解，而亞共存續？蘇東巨變如同提供了一場全球性的巨型實驗，使具有同一體制的共黨政權在同一時間受到強烈的衝擊，而出現了截然不同的結局。從此一實驗中抽繹出有關共黨政權超體系變動的因果關係，自然具有重大的意義，而這就是比較共產主義的擅場之處。

對巨變後歐亞共結局不同的諸般解釋當中，有討論文化因素者，有強調國際影響者（包括地理與示範效應），有專注經濟社會者，有突出政權特質者，也有採用過程途徑或危機途徑者。²⁰由於案例頗為豐富，理論也頗為多元，因此構成了比較共產主義的一個重要的研究區塊。蘇東巨變之後，對於中國未來發展的各種學術討論，幾皆不脫上述的理論範疇（例如Pei [2008, 2016]、林佳龍、徐斯儉〔2003〕；黎安友著，何大明譯〔2007〕）。因此在研究中共百年後其政權是否可能出現超體制變遷的可能性時，比較共產主義對於蘇東巨變後存續與崩潰的共黨政權之研究，是一個必須探訪的理論資源。

綜合而言，共黨政權的統治基礎是保持三大關鍵變項在常態範圍內變動，而不會超越邊界；一旦越界，共黨政權就會轉型為他種政治體系。黨國體系的邊界是以共黨是否完全壟斷政治權力、掌控政治參與，以及不存在反對黨來決定。以歷史的經驗來看，在蘇東巨變之前，共黨政權僅出現過體系內的變動，最主要的便是從史達林式的最高領袖絕對獨裁、低制度化，與黨國高度侵入並改造社會轉變為後史達林（或後極權）的集體領導、最高階層遵守制度規則，與容認特定社會自主範圍及參詢社會意見二者之間變動。在這兩個次類型（極

在 40 年代建立政權，在 80 年代左右實施了經濟漸進改革，在菁英政治都發展出一套有跡可尋的規則，進入了制度化的階段，在權力轉移上，發展出一套政治菁英定期、規律、和平交接的政治繼承機制。而其他僅存的共黨政權—北朝鮮、寮國、古巴—都尚未發展出定期與規律的權力轉移機制，這是中越共黨與其他共黨政權最為不同之處（吳安琪，2017）。

²⁰ 相關的文獻頗為豐富，有關於其文獻分析，參見吳玉山（1994，1995：第二章、第三章）與 Wu (2001)。關於多途徑的分析，參見 Dimitrov (2013) 與 Saxonberg (2013)。

權與後極權)的內部,也可能發生較小範圍的轉變。歷史上跨體系的變動主要是集中於1989~1991年間的蘇東巨變,那是表現在多國的共黨政權喪失了政治壟斷權力、政治參與脫出其控制,及獨立自主的反對勢力出現並成功地挑戰了黨國體制。以蘇聯的例子而言,史達林時期建立了極權主義的體系,在史達林死後則進入了後極權的赫魯雪夫與布里茲涅夫時期。在這兩個後史達林的時期都大大減低了最高領袖的獨裁權力,並走向集體領導;建立了一定程度的制度化(但到後期逐漸趨向僵固);以及停止改造並開始吸納社會。這些體制的變動帶來了一個超穩定的結構,並使得蘇聯在冷戰時期發展成與美國長期競爭的超級強國。但是體系的僵固使得其無法對抗美國在雷根主義下的強大壓力,而催生了戈巴契夫的「公開性」、「改造」與「民主化」。戈巴契夫改革的特異之處,在於以鬆動共黨政治壟斷的方式來動員社會,目的在擊敗其黨內保守派的對手。此一激進舉動與戈巴契夫的黨內權力基礎不夠牢固有關,但是其影響則是跨越了黨國體系的邊界,引發了蘇聯社會的多重危機,從而造成了整個體系、包括蘇聯集團的最終崩潰。從蘇聯的例子當中,我們可以看到共黨體系的持續力、國際挑戰的重要性,與體系從上開始崩解的現象。一方面黨國體系有內建的穩定性,一方面它還是可以發生超體系的變動。這兩個現象在使用比較共產主義的視角來分析今日存續的共產政權時都值得深入省思。

陸、結論

比較共產主義的研究是因為二戰後共產世界從蘇聯擴張到全球而興起,其最具持久影響力的研究典範是極權主義,主要原因是它掌握了共產政權的核心特徵。史達林死後中蘇共的分途發展對極權主義理論構成嚴重的挑戰,並且突出了它缺乏對變動的解釋機制。不過中蘇共的制度分歧與相互交惡卻給比較共產主義帶來進一步發展的契機,因為中蘇之間同樣的制度基礎與明顯的運作差異提供了比較研究最有利的環境。1960年代成為比較共產主義發展極為重要的時期,此一學科領域正式躍上學術舞臺,並且自我意識到已經超越了區域研究,而成為比較政治與社會科學的一支。然而與許多學科研究一樣,比較共產主義接受了一套議題與方法上的假設,並愈來愈專注於精細的議題,而將共產政權的存在當作學科預設,因此無法處理共產政權的崩潰問題,也就是無法處理本身研究對象的消滅。當蘇聯解體、歐洲共產政權逐一崩潰之時,比較共產主義猝不及防,無法提供預測與解釋,而顯現整體失能的狀態,也因而面臨了自身存亡的挑戰。蘇東巨變之後,由於共產世界的快速萎縮,比較共產主義失去了經驗對象,而從比較政治的研究中淡出。

中國政治的研究失去了比較共產主義的依托，乃往兩個方向發展：一是中國的區域研究，一是比較威權主義研究。前者比原有的比較共產主義更為分殊細化，後者則更為一般化，因此是兩個相反的發展趨勢。不過，此二趨勢各有其不足之處。由於今日中國的政體就是列寧主義的黨國體制，因此對於中國政治的研究便不能不從此出發。共黨體制既不能窄化成是中國獨特的制度（因為在歷史與現實中許多其他的國家均具有此種政體），也不能概括為威權體制（因為那樣做會漏失了此一體系的核心特徵），而必須加以據實檢視。比較共產主義在層次上處於中國區域研究與比較威權研究之間，恰巧屬於最適當的中間階層研究路徑，因此具有很大的研究利基。

比較共產主義的學術意義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個是提供概念框架與關鍵變項；一個是提供跨時與現實的經驗案例。就概念框架與關鍵變項而言，比較共產主義研究所持續關注的核心變項是：第一、黨內權力集中於最高領袖的程度，第二、政治制度化的程度，與第三、黨國控制（包括驅動與回應）社會的程度。在共黨壟斷一切政治權力下，黨內權力可以在一人絕對獨裁與集體領導／菁英分裂競爭的狀態間移動，制度化可以在打破一切既有規律與全黨（包括最高領導人）服從明文與非正式遊戲規則間轉移，而黨國社會權力關係可以在黨國恣意介入動員與容認特定社會自主範疇之間變動。然而無論一個共黨政權在這三個面向上如何轉變，只要共黨壟斷一切政治權力的基礎特徵不變，黨國體制的框架就能夠維持。而共黨的權力壟斷則是根植於不存在獨立的反對黨，與不存在競爭性的選舉。如果變動是在常態性的範圍之內，而共黨維持政治權力的壟斷，則出現的是體系內的變動；如果產生了常態範圍之外的變化，使得共黨失去了對於政治權力的壟斷，則出現的是超體系的變動。

就提供跨時與現實的經驗案例而言，從蘇聯成立到歐共政權崩潰之間的70餘年間，共產世界提供了大量體系內變動的案例；而蘇東巨變又帶來了同樣大量的超體系變動案例。靠著這兩套經驗案例，比較共產主義的研究可以針對兩類議題進行研究設計，第一類議題是驅動黨國體系內變動的原因，第二類議題是導致超體系變動的因素。前者可以回答習近平時代「再毛化」的現象，與越南的比較尤具意義；後者可以回答為何歐共崩解而亞共存續，並探討中共政權的穩定性與存續能力。

今日的中共政權，展現出的是一個成熟的共黨體制，在1949年建立之後，它通過了文革與蘇東巨變兩大考驗，而能持續發展，並正與美國競爭全球霸權。這樣的一個政權要如何理解，顯然不能脫離將其與同體制的其他國家和案

例進行比較，而這就是比較共產主義。今日在習近平的領導之下，中國大陸所出現的各種「再毛化」的現象，包括黨內權力高度集中於最高領袖、反制度化、黨國對社會的加大控制，讓我們重新認識了中共體制的根源與傳統，明白了體系內變動（三大關鍵變項在一定範圍內擺盪）的可能性與限制性，以及體認到超體系變動的困難。越南共黨政權的類似發展，也讓我們感受到這是一種東亞共產政權的體系現象，而不限於單一國家。因此透過體系與區域的觀點，對於單一國家的發展，可以有更為深入的理解。至於如果要討論中共政權是否有跨體系變動的可能性，則必須要認識到東亞共產政權的存續，是一個突出的區域現象（歐洲的九個共黨政權已經全數崩解，在存續的五個共黨政權當中有四個在東亞），這代表中共政權的存續不能僅視為一種中國現象（因為還有其他的東亞共產政權持續發展），但是也不能夠視為一種共產體系的總體現象（因為歐洲的共產政權都已經崩潰了）。因此，想要瞭解中共政權超體系變動的可能性，便需要提出對於東亞的區域特性敏感的比較共產主義理論，而透過這種理論，可以讓我們更深入地探討中共的政治穩定性。

在中共百年之際，如能喚回比較共產主義，重拾其理論眼光，無疑將對於今日中國政治的掌握與未來穩定性的預判具有重大助益。當然，由於這裡探索的標的是新的現象，而比較共產主義的基本理論框架是建立在過去的經驗事例之上，因此如何使其得以捕捉中共政權的結構性特徵，而又能掌握中國大陸快速變遷的政治、經濟與社會局勢（特別是科技的急速發展），從而對於政權的穩定性做出理解與推論是一個艱鉅的任務。然而分析現象必須掌握結構，理解現實需要溯其根源，比較共產主義在此扮演一個不可或缺的角色。它的重要性在於充分地認識到共產黨在其所建立的國家中所扮演的角色，並引領研究者去探索這樣的體制在中國大陸與東亞地區所代表的意義。本文所提的概念框架與三大關鍵變項，以及跨時與現實的經驗案例，只是喚回比較共產主義的第一步。「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深信此一研究議程具有其重大的時代意義。

參考文獻

一、中文部分

- 吳玉山，1994，〈破與立：審視東歐民主轉型的理論〉，《政治科學論叢》，第5期，頁161-181。
- 吳玉山，1995，《共產世界的變遷——四個共黨政權的比較》，臺北：東大。
- 吳玉山，1996，《遠離社會主義：中國大陸、蘇聯和波蘭的經濟轉型》，臺北：正中。
- 吳玉山，2007，〈宏觀中國：後極權資本主義發展國家——蘇東與東亞模式的揉合〉，載於徐斯儉、吳玉山《編》，《黨國蛻變：中共政權的菁英與政策》（頁309-355），臺北：五南。
- 吳玉山編，2018，《中國再起：歷史與國關的對話》，臺北：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東亞儒學研究中心。
- 吳玉山，2019，〈五四的時代意義——從當代自由主義的危機談起〉，載於李瑞騰、莊宜文《編》，《再現、傳承與超越：五四運動一百年》（頁7-11），桃園：國立中央大學。
- 吳安琪，2017，《多頭馬車或定於一尊？比較越南與中國大陸的領導體制與權力轉移（1986~2016）》，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碩士學位論文。
- 周玉山，1979，〈五四歷史不容篡奪〉，載於周策縱等（著），周陽山（編），《五四與中國》（頁538-550），臺北：時報文化。
- 林佳龍、徐斯儉，2003，〈退化的極權主義與中國未來發展〉，載於林佳龍（編），《未來中國：退化的極權主義》（頁11-30），臺北：時報文化。
- 金耀基，1979，〈中國文化意識之變與反省——從「五四」到「四五」的歷史轉折〉，載於周策縱等（著），周陽山（編），《五四與中國》（頁460-492），臺北：時報文化。
- 寇健文，2000，〈政治繼承與共黨政權結構穩定性的比較研究〉，《問題與研究》，第39卷，第3期，頁57-73。doi:10.30390/ISC.200003_39(3).0004
- 寇健文，2010，《中共菁英政治的演變——制度化與權力轉移1978-2010》，臺北：五南。
- 陳國祥，1980，〈五四運動與馬列運動〉，載於周玉山（編），《五四論集》（頁631-642），臺北：成文。
- 郭華倫，1989，《中共史論（四冊）》（四版），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 梁錦文，2006，〈越南共產黨政治局之研究〉，《政治科學論叢》，第27期，頁1-40。doi:10.6166/TJPS.27(1-40)
- 梁錦文，2020，《越南政府與政治》，臺北：翰蘆。
- 齊墨，1991，〈新權威主義論戰評述〉，載於齊墨（編），《新權威主義：對中國大陸未來命運的論爭》（頁234-277），臺北：唐山。
- 黎安友著，何大明譯，2007，《從極權統治到韌性威權：中國政治變遷之路》，臺北：巨流、國立清華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
- 劉晶芳，2009，〈五四運動與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載於北京新文化運動紀念館、北京魯迅博物館（編），《紀念五四運動90週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14-25），北京：文物。

二、英文部分

- Arendt, H., 1951.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New York: Harcourt.
- Bachman, D., 1992. "The Limits on Leadership in China." *Asian Survey*, Vol. 32, No. 11, pp. 1046-1062. doi:10.2307/2645270
- Bachman, D., 2001. "The Paradox of Analysing Elite Politics under Jiang." *The China Journal*, Vol. 45, pp. 95-100. doi:10.2307/3182370
- Barnett, A. D., 1964. *Communist Strategies in Asia: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Governments and Parties*. London, UK: Pall Mall Press.
- Bernstein, T. P., 1984. "Stalinism, Famine, and Chinese Peasants." *Theory and Society*, Vol. 13, No. 3, pp. 339-377. doi:10.1007/BF00213230
- Bo, Z., 2004.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Elite Management in China." In B. J. Naughton & D. L. Yang, ed., *Holding China Together: Diversity and National Integration in the Post-Deng Era* (pp. 70-100).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oi:10.1017/CBO9780511617157.003
- Bo, Z.-Y., 2005. "Political Succession and Elite Politics in Twenty-First Century China: Toward a Perspective of 'Power Balancing.'" *Issues & Studies*, Vol. 41, No. 1, pp. 162-189. doi:10.7033/ISE.200503_41(1).0005
- Breslauer, G. W., 1982. *Khrushchev and Brezhnev as Leaders: Building Authority in Soviet Politics*. London, UK: George Allen and Unwin.
- Breslauer, G., 2020. "The Rise and Fall of World Communism, Spring 2020." in *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b3F7UniMnw>, Available: 2021/2/15.
- Brzezinski, Z., 1960. *The Soviet Bloc: Unity and Conflict*. Cambridge, MA: Harvard

- University Press.
- Burks, R. V., 1961. *The Dynamics of Communism in Eastern Europ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Chow, T.-T., 1960. *The May 4th Movement: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Cohen, S. F., 1985. *Rethinking the Soviet Experience: Politics and History Since 1917*.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ox, M., 2008. "1989 and Why We Got It Wrong." in *Social Science Open Access Repository*: <https://nbn-resolving.org/urn:nbn:de:0168-ssoar-16282>, Available: 2021/2/22.
- Dimitrov, M. K., 2013. *Why Communism Did Not Collapse: Understanding Authoritarian Regime Resilience in Asia and Europ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ittmer, L., 1978. "Bases of Power in Chinese Politics: A Theory and an Analysis of the Fall of the 'Gang of Four.'" *World Politics*, Vol. 31, No. 1, pp. 26-60. doi:10.2307/2009966
- Dittmer, L., Fukui, H., & Lee, P. N. S., 2000. *Informal Politics in East Asia*. Cambridge, M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ittmer, L., & Wu, Y.-S. 1995. "The Modernization of Factionalism in Chinese Politics." *World Politics*, Vol. 47, No. 4, pp. 467-494. doi:10.1017/S0043887100015185
- Domes, J., 1990. "The Next Power Struggle." In G. Hicks, ed., *The Broken Mirror: China after Tiananmen* (pp. 466-472). Harlow, UK: Longman.
- Fainsod, M., 1963. *How Russia Is Ruled*.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Friedrich, C. J., & Brzezinski, Z. K., 1956. *Totalitarian Dictatorship and Autocrac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Fukuyama, F., 1992.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 Gandhi, J., 2008. *Political Institutions under Dictatorship*. Cambridge, M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andhi, J., & Przeworski, A., 2006. "Cooperation, Cooptation, and Rebellion under Dictatorships." *Economics & Politics*, Vol. 18, No. 1, pp. 1-26. doi:10.1111/j.1468-0343.2006.00160
- Gandhi, J., & Przeworski, A., 2007. "Authoritarian Institutions and the Survival of Autocrat."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40, No. 11, pp. 1279-1301. doi:10.1177/0010414007305817

- Harding, H., 1984a. "Competing Model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olicy Process: Toward a Sorting and Evaluation." *Issues & Studies*, Vol. 20, No. 2, pp. 13-36.
- Harding, H., 1984b. "The Study of Chinese Politics: Toward a Third Generation of Scholarship." *World Politics*, Vol. 36, No. 2, pp. 284-307. doi:10.2307/2010235
- Harding, H., 1987. *China's Second Revolution: Reform after Mao*.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 He, B., & Thøgersen, S., 2010. "Giving the People a Voice? Experiments with Consultative Authoritarian Institutions in Chin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19, No. 66, pp. 675-692. doi:10.1080/10670564.2010.485404
- Hough, J. F., & Fainsod, M., 1979. *How the Soviet Union Is Governed*.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Hsu, S. P., Wu, Y.-S., & Zhao, S., 2011. *In Search of China's Development Model: Beyond the Beijing Consensus*. London, UK: Routledge.
- Huntington, S. P., 1993.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Norman, OK: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 Huntington, S. P., 1998.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London, UK: Touchstone Books.
- Johnson, C. A., 1962. *Peasant Nationalism and Communist Power: The Emergence of Revolutionary China, 1937-1945*.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Jowitt, K., 1974. "An Organizational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Political Culture in Marxist-Leninist System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68, No. 3, pp. 1171-1191. doi:10.2307/1959154
- Jowitt, K., 1975. "Inclusion and Mobilization in European Leninist Regimes." *World Politics*, Vol. 28, No. 1, pp. 69-96. doi:10.2307/2010030
- Jowitt, K., 1983. "Soviet Neotraditionalism: The Political Corruption of a Leninist Regime." *Soviet Studies*, Vol. 35, No. 3, pp. 275-297. doi:10.1080/09668138308411481
- Jowitt, K., 1993. *New World Disorder: The Leninist Extinction*.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Kassof, A., 1964. "The Administered Society: Totalitarianism without Terror." *World Politics*, Vol. 16, No. 4, pp. 558-575. doi:10.2307/2009446
- Kerkvliet, B., Chan, A., & Unger, J., 1998. "Comparing the Chinese and Vietnamese Reforms: An Introduction." *The China Journal*, Vol. 40, pp. 1-7. doi:10.2307/2667451
- Kim, W., & Gandhi, J., 2010. "Coopting Workers under Dictatorship." *The Journal of*

- Politics*, Vol. 72, No. 3, pp. 646-658. doi:10.1017/s0022381610000071
- King, G., Pan, J., & Roberts, M. E., 2013. "How Censorship in China Allows Government Criticism but Silences Collective Express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107, No. 2, pp. 326-343. doi:10.1017/S0003055413000014
- King, G., Pan, J., & Roberts, M. E., 2014. "Reverse-Engineering Censorship in China: Randomized Experimentation and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Science*, Vol. 345, No. 6199. doi:10.1126/science.1251722
- King, G., Pan, J., & Roberts, M. E., 2017. "How the Chinese Government Fabricates Social Media Posts for Strategic Distraction, not Engaged Argumen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111, No. 3, pp. 484-501. doi:10.1017/S0003055417000144.
- Kirkpatrick, J. J., 1983. *Dictatorships and Double Standards: Rationalism and Reason in Politics*. Washington, DC: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 Lee, C. K., & Zhang, Y., 2013. "The Power of Instability: Unraveling the Microfoundations of Bargained Authoritarianism in China."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118, No. 6, pp. 1475-1508. doi:10.1086/670802
- Levitsky, S., & Way, L. A., 2010. *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 Hybrid Regimes after the Cold War*. Cambridge, M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ieberthal, K. G., 1992. "Introduction: The 'Fragmented Authoritarianism' Model and Its Limitations." In K. G. Lieberthal & D. M. Lampton, eds., *Bureaucracy, Politics, and Decision Making in Post-Mao China* (pp. 1-32).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Lieberthal, K., & Oksenberg, M., 1988. *Policy Making in China*.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doi:10.1515/9780691221724
- Lijphart, A., 2000. "The Future of Democracy: Reasons for Pessimism, but Also Some Optimism." *Scandinavian Political Studies*, Vol. 23, No. 3, pp.265-272.
- Linz, J. J., 2000. *Totalitarian and Authoritarian Regimes*.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 Lowenthal, R., 1970. "Development vs. Utopia in Communist Policy." In C. Johnson, ed., *Change in Communist Systems* (pp. 33-116).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Lowenthal, R., 1974. "On 'Established' Communist Party Regimes." *Studies in Comparative Communism*, Vol. 7, No. 4, pp. 335-358. doi:10.1016/0039-3592(74)90009-X
- Lowenthal, R., 1983. "The Post-Revolutionary Phase in China and Russia." *Studies in Com-*

- parative Communism*, Vol. 16, No. 3, pp. 191-201. doi:10.1016/0039-3592(83)90005-4
- Lü, X., Liu, M., & Li, F., 2020. "Policy Coalition Building in an Authoritarian Legislature: Evidence from China's National Assemblies (1983–2007)."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53, No. 9, pp. 1380-1416. doi:10.1177/0010414018797950
- Magaloni, B., 2008. "Credible Power-Sharing and the Longevity of Authoritarian Rule."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41, No. 4/5, pp. 715-741. doi:10.1177/0010414007313124
- McCormick, B. L., 1998. "Political Change in China and Vietnam: Coping with the Consequences of Economic Reform." *The China Journal*, Vol. 40, pp. 121-143. doi:10.2307/2667456
- Mertha, A., 2009. "'Fragmented Authoritarianism 2.0': Political Pluralization in the Chinese Policy Process." *The China Quarterly*, Vol. 200, pp. 995-1012. doi:10.1017/S0305741009990592
- Meyer, A., 1964. "USSR, Incorporated." In D. W. Treadgold, 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USSR: An Exchange of Views* (pp. 21-28). Seattle, WA: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 Michael, F., 1990. "China and the Crisis of Communism." In G. Hicks, ed., *The Broken Mirror: China after Tiananmen* (pp. 445-455). Harlow, UK: Longman.
- Myers, R. H., 1990. "The Next Power Struggle." In G. Hicks, ed., *The Broken Mirror: China after Tiananmen* (pp. 456-465). Harlow, UK: Longman.
- Nathan, A. J., 1973. "A Factionalism Model for CCP Politics." *The China Quarterly*, Vol. 53, pp. 34-66. doi:10.1017/S0305741000500022
- Nathan, A. J., 2003. "China's Changing of the Guard: Authoritarian Resilience."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14, No. 1, pp. 6-17. doi:10.1353/jod.2003.0019
- Odom, W. E., 1992. "Soviet Politics and after: Old and New Concepts." *World Politics*, Vol. 45, No. 1, pp. 66-98. doi:10.2307/2010519
- O'Donnell, G. A., 2013. *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Tentative Conclusions about Uncertain Democracies*.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Pei, M., 2008. *China's Trapped Transition: The Limits of Developmental Autocrac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Pei, M., 2016. *China's Crony Capitalism: The Dynamics of Regime Deca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Pepinsky, T., 2014. "The Institutional Turn in Comparative Authoritarianism."

-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44, No. 3, pp. 631-653. doi:10.1017/S0007123413000021
- Perry, E. J., 1994. "Trends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Politics: State-Society Relations." *The China Quarterly*, Vol. 139, pp. 704-713. doi:10.1017/S0305741000043113
- Pye, L. W., 1981. *The Dynamics of Chinese Politics*. Cambridge, MA: Oelgeschlager, Gunn & Hain.
- Pye, L. W., 1992. *The Spirit of Chinese Politic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Saxonberg, S., 2013. *Transitions and Non-Transitions from Communism: Regime Survival in China, Cuba, North Korea and Vietnam*. Cambridge, M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calapino, R. A., 1969.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in Asia*.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 Schurmann, H. F., 1966. *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Shirk, S. L., 2001. "Will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Party Leadership Survive the 2002–03 Succession?" *The China Journal*, Vol. 45, pp. 139-142. doi:10.2307/3182375
- Skilling, H. G., 1966. "Interest Groups and Communist Politics." *World Politics*, Vol. 18, No. 3, pp. 435-451. doi:10.2307/2009764
- Skilling, H. G., & Griffiths, F., 1971. *Interest Groups in Soviet Politic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Solinger, D. J., 1993. *China's Transition from Socialism: Statist Legacies and Market Reforms, 1980–1990*. Armonk, NY: M. E. Sharpe.
- Teets, J. C., 2013. "Let Many Civil Societies Bloom: The Rise of Consultative Authoritarianism in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Vol. 213, pp. 19-38. doi:10.1017/S0305741012001269
- Treadgold, D., 1970. *Soviet and Chinese Communism: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Seattle, WA: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 Truex, R., 2017. "Consultative Authoritarianism and Its Limit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50, No. 3, pp. 329-361. doi:10.1177/0010414014534196
- Tsai, W.-H., 2016. "How 'Networked Authoritarianism' was Operationalized in China: Methods and Procedures of Public Opinion Control."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25, No. 101, pp. 731-744. doi:10.1080/10670564.2016.1160506

- Tsai, W.-H., & Dean, N., 2013. "The CCP's Learning System: Thought Unification and Regime Adaptation." *The China Journal*, Vol. 69, pp. 87-107. doi:10.1086/668806
- Tsai, W.-H., & Kou, C.-W., 2015. "The Party's Disciples: CCP Reserve Cadres and the Perpetuation of a Resilient Authoritarian Regime." *The China Quarterly*, Vol. 221, pp. 1-20. doi:10.1017/S0305741015000338
- Tucker, R. C., 1967. "On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Communism." *World Politics*, Vol. 19, No. 2, pp. 242-257. doi:10.2307/2009612
- Wang, G., 2004. "The Fourth Rise of China: Cultural Implications." *China: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 2, No. 2, pp. 311-322. doi:10.1353/chn.2004.0016
- Way, L. A., 2005. "Authoritarian State Building and the Sources of Regime Competitiveness in the Fourth Wave: The Cases of Belarus, Moldova, Russia, and Ukraine." *World Politics*, Vol. 57, No. 2, pp. 231-261. doi:10.1353/wp.2005.0018
- White, G., 1993. *Riding the Tiger: 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Reform in Post-Mao Chin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White, S., 1987. "Comparative Communist Politics: Towards the Second Generation." *Studies in Comparative Communism*, Vol. 20, No. 2, pp. 209-212. doi:10.1016/0039-3592(87)90005-6
- Whitson, W., 1969. "The Field Army in Chinese Communist Military Politics." *The China Quarterly*, Vol. 37, pp. 1-30. doi:10.1017/S0305741000048967
- Willerton, J., P. 1987. "Patronage Networks and Coalition Building in the Brezhnev Era." *Soviet Studies*, Vol. 39, No. 2, pp. 175-204. doi:10.1080/09668138708411685
- Wright, J., 2008. "Do Authoritarian Institutions Constrain? How Legislatures Affect Economic Growth and Investment."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52, No. 2, pp. 322-343. doi:10.1111/j.1540-5907.2008.00315.x
- Wright, T., 2010. *Accepting Authoritarianism: State-Society Relations in China's Reform Er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Wu, Y.-S., 1997. "From Reform to Bureaucratic Stability in the PRC." *Issues and Studies*, Vol. 33, No. 8, pp. 81-104. doi:10.7033/ISE.199708_33(8).0005
- Wu, Y.-S., 2001. "Les Voies Du Communisme." *Raisons Politiques*, Vol. 3, pp. 19-36.
- Wu, Y.-S., 2004. "Jiang and After: Technocratic Rule, Generational Replacement, and Mentor Politics." In Y.-h. Chu, C.-c. Lo, & R. H. Myers, eds., *The New Chinese Leadership: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after the 16th Party Congress* (pp. 69-88). Cambridge, M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u, Y.-S., 2015. "Rejuvenation of the Party-State: The Virtues and Limits of an Age-Based Political System." *Issues & Studies*, Vol. 51, No. 1, pp. 99-128. doi:10.7033/ISE.201503_51(1).0004
- Wu, Y.-S., & Sun, T.-W., 1998. "Four Faces of Vietnamese Communism: Small Countries' Institutional Choice under Hegemony."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Vol. 31, No. 4, pp. 381-399. doi:10.1016/S0967-067X(98)00018-X